

# 全球对话

# GLOBAL DIALOGUE

4.1

4 issues a year in 14 languages

Simon Clarke –  
启发性的合作

社会学志业

Alain Touraine,  
Kalpana Kannabiran

智利民主转型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乌拉圭社会民主

Felipe Arocena,  
Adriana Marrero  
and Leandro Pereira,  
Marcos Supervielle  
and Mariela Quiñones,  
Diego Piñeiro

匈牙利向右转

György Csepeli,  
Eszter Bartha,  
György Lengyel

- > 南非女矿工
- > 科特迪瓦的手机文化
- > 欧洲社会学会议
- > 拉美社会学会的最后宣布
- > 社会转型和数位时代
- > 俄国团队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4卷 / 第1期 / 2014/03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http://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 主编的话

### 反抗新自由主义

**我**们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市场无远弗届，所到之处，所有的领域无可幸免。从所谓的创新劳动变成了更不确定的生存法则；从金钱交换制度变成了用钱滚钱的游戏，让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从生命、自然等的维护都被资本主义所侵略，然后变成商品，鼓励掠夺。曾经是公共财的知识也变成了学生取得文凭的工具和企业取得研究资金的手段。商品化是一个恶性循环，且看不到尽头。

可是市场也产生了反作用力，像是社会运动或是国家管制。这个议题在本期内关于乌拉圭的四篇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对全球市场化做出回应，包括的重分配政策、堕胎合法化、同志婚姻、大麻的社会政策，以其公共教育。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侵蚀了农业，让农业社会变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第二任的执政党社会主义联盟包括了一些前游击战的成员，他们正推动社会民主，和智利截然不同。尽管在选举上，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也都有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是乌拉圭相对比较人道和成功。

若乌拉圭是拉丁美洲的特例，那么匈牙利就是前苏联集团的特例。但这个特例的意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威权民粹主义，另一种响应市场的方式。所以三篇关于匈牙利的文章描述了黑道国家的兴起，如何由 **Viktor Orbán** 所把持，和乌拉圭总统 **José Mujica** 谦逊的一生完全不同。匈牙利政治精英伤害民主和公共辩论，让阶级的概念丧失信用，扭曲，并且用民族沙文主义反对犹太人和 Roma 族群，并把欧盟当作是代罪羔羊，把匈牙利经济萧条推给他们。

这两个国家有非常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所也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响应也大相径庭。但是不论社会民主或是民粹威权，他们有能力阻挡甚至翻转市场化的趋势吗。新自由主义的翻转需要包括国家层次和全球层次的运动，而那又是什么？这种运动会扩大或是限制了自由？我们会成功吗？还是会走向集体毁灭？



Simon Clarke正接受两位他的学生的访问。访谈内容关于其与年轻有才气的俄国社会学家合作，研究市场转型的许多案例。



Alain Touraine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描述其革命性的理论以其创新且广被接收的方法论，主要在社会运动领域。他早期是乐观主义者，近期则成为悲观主义者。



Kalpana Kannabiran杰出的社会学家，同时也是印度的社会运动者。他正在描述社会学和批判法学之间可能的共生关系，以及如何促进社会正义。

全球对话以 15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mailto:burawoy@berkeley.edu)

## > 编辑团队

### 主编:

Michael Burawoy

###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 区域编辑

####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Celia Arribas, Rafael de Souza

####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Uday Singh

####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Faezeh Khajehzade, Nastaran Mahmoodzade, Saghar Bozorgi, Zohreh Sorooshfar.

#### 日本:

西原和久、芝真里、姫野宏輔、高見具広、岩館豊、池田和弘、福田 雄、三部倫子、堀田裕子、小坂有資、小杉亮子、土田久美子、仲修平、加瀬希和子、大森美佐、毛塚和宏

#### 波兰: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rzysztof Gubański, Adam Mueller, Patrycja Pendrakowska, Emilia Hudzińska, Kinga Jakiela, Julia Legat, Kamil Lipiński,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Monica Alexandru,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Monica Nădrag, Cătălina Petre, Mădălin Rapan, Lucian Rotariu, Alina Stan, Mara Stan, Balazs Telegdy,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 台湾:

何经懋

####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 乌克兰:

Svitlana Khutka, Olga Kuzovkina, Anastasia Denisenko, Mariia Domashchenko, Iryna Klietsova, Lidia Kuzemska, Anastasiya Lipinska, Myroslava Romanchuk, Ksenia Shvets, Liudmyla Smoliiar, Oryna Stetsenko, Polina Stohnushko

媒体顾问: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bigail Andrews

## > 本期内容

|                                               |    |
|-----------------------------------------------|----|
| 主编的话：反抗新自由主义                                  | 2  |
| 与俄国社会学家的合作                                    |    |
| An Interview with Simon Clarke, 英国            | 4  |
| 社会学志业：超越社会学之外                                 |    |
| by Alain Touraine, 法国                         | 7  |
| 社会学志业：法律和社会的对话                                |    |
| by Kalpana Kannabiran, 印度                     | 9  |
| 民主转型的挑战                                       |    |
| An Interview with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智利 | 12 |

### > 乌拉圭的社会民主

|                                                 |    |
|-------------------------------------------------|----|
| 走在拉美前端的乌拉圭                                      |    |
| by Felipe Arocena, 乌拉圭                          | 15 |
| 乌拉圭公共教育的公共性                                     |    |
| by Adriana Marrero and Leandro Pereira, 乌拉圭     | 17 |
| 乌拉圭奇迹：重分配和工会                                    |    |
| by Marcos Supervielle and Mariela Quinones, 乌拉圭 | 19 |
| 乌拉圭的农业革命                                        |    |
| by Diego E. Piñeiro, 乌拉圭                        | 21 |

### > 匈牙利向右转

|                        |    |
|------------------------|----|
| 匈牙利黑道国家的兴起             |    |
| by György Csepeli, 匈牙利 | 23 |
| 当代匈牙利的阶级命运             |    |
| by Eszter Bartha, 匈牙利  | 25 |
| 精英的(不)负责               |    |
| by György Lengyel, 匈牙利 | 27 |

### > 田野笔记

|                        |    |
|------------------------|----|
| 南非：地底下的女矿工             |    |
| by Asanda Benya, 南非    | 30 |
| 科特迪瓦：手机的象征资本           |    |
| by Jordanna Matlon, 法国 | 33 |

### > 会议报告

|                                      |    |
|--------------------------------------|----|
| 欧洲社会学会议                              |    |
| by Jennifer Platt, 英国                | 35 |
| 最后的宣布                                |    |
| Adopted at XXIX Congress of ALAS, 智利 | 37 |
| 社会转型和数位时代                            |    |
| by Elisa P. Reis, 巴西                 | 39 |
| 俄国编辑团队                               |    |
| by Elena Zdravomyslova, 俄国           | 40 |



# > 与俄国 社会学家 的启发性合作

## 访谈Simon Clarke

**在**1980年代，英国 Warwick 大学的社会学者 Simon Clarke 是一位很著名的理论家，特别是其原创性对于马克思的诠释以及对于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基础的批判。1990年代，Clarke 到了苏联，从此开启了另外 20 年的新研究生涯，和许多国外学者合作。他是俄国社会学其中一个新学派的主要推手，关心社会的大转型。他和同事 Peter Fairbrother 一起建立了俄罗斯研究者的网络，成立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abour Relations Research (ISITO)。在这里，Clarke 和俄国学者生产了很多研究，分析经济改革对于劳动和家庭的影响，以及劳工和组织的响应。这些研究在规模、深度、原创性上，都非常杰出，也对支配性的新自由主义提出很大的挑战。ISITO 的文化也值得提出来。若是苏联的阶层和支配组织是其特色的话，那么 ISITO 是一个由 Simon Clarke 管理的合作平台，以信任、友情、互惠学习为原则。这篇文章是其两位学生 Sarah Ashwi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和 Valery Yakubovich (ESSEC Business School, France) 所访谈。

**Valery:** 从晚期 1980 年代开始，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到苏联去观察“自然实验”，研究社会变迁，但很少人成立新的研究机构。你怎么想出这个点子的？



Simon Clarke和来自Samara的知名社会学家。

SC: Annie Phizacklea 和我在 Warwick 大学找了一批学生到俄国。那时是 1990 年 3 月。我马上被这些新的机会吸引了。很偶然的我遇到了 Svetlana Natalushko，他负责进阶社会学课程，是由 Galina Mikhalyova 所资助，在 Higher Komsomol School 进行（后来改名叫做 Institute of Youth）。在没有民主选举的情况之下，民意调查成为了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在 80 年代的重建时期对于党和工会组织想要取得权力来说，很重要。所以很多想要发展其社会知识的运动者会到 Moscow 来念社会学，因为那里相对进步。后来我被邀请回去上了一个星期的课，记得是 12 月的时

>>



候，学生有 Vadim Borisov 和 Olga Rodina，他们后来是 ISITO 的核心成员。来年的 3 月时候，Peter Fairbrother 和我带了一批学生，和更多的年轻社会学家见面，我想包括了你 Valery Yakubovich，还有 Vladimir (“Volodya”) Ilyin 和 Petr Bizyukov，另外还和一些劳工运动者会面。

在那个时候，像你说的，许多西方社会学家都在苏联开始其研究，但是许多人其实室外包收集资料的工作给苏联的研究单位，调查机构，或是研究生，他们可以生产出大量便宜的数据（质化在苏联被认为是不科学的），或是引用他们的旧的研究报告。但我们对于分析二手数据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认为不可靠，所以想自己收集数据。而一个明显的阻碍是时间和语言，但是 Vadim, Volodya, 和 Olga 可以当翻译者，帮助我们进行访问。然后我们也有非常感兴趣的田野研究者。我们和那些想要合作的人见面，解释我们的计划，不过我们很清楚表示没有资金。这足够区别出那些想要钱和想做研究的人。最后研究团队在 Moscow, Syktyvkar, Samara, 和 Kemerovo 成立了，领导的人分别是 Vadim Borisov, Vladimir Ilyin, Irina Kozina, Petr Bizyukov, 和 Veronika Kabalina。

后来我们在 Perm, Yekaterinburg, St Petersburg, Ulyanovsk, 和 Ivanovo 建立了研究团队。整个团队以成员的友谊和信念为基础，起初并没有什么制度的架构，但是我们很坚持要有要一个研究空间，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原本的制度不会延续，但是我们成员研究需要基础，所以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同一性，合作才有可能。最后在历经许多的官僚层级之间的努力与失败之后，我们建立了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abour Relations Research (ISITO)，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有银行帐户，有管理委员会，执行长、帐务人员，并且缴税。不过整个研究团队还是以友情、合作、信念为核心去运作。

**Sarah:** 如你所说的，质化在苏联被认为不科学，所以 ISITO 的成员有田野的训练吗。还是你训练的？

**Valery:** 我记得尽管这个“不科学”的名声，质化研究在俄国则是广被接受了，特别是在 1990 年代。你觉得没有质化的方法，什么东西最有可能被忽略？

**SC:** 我们设立研究中心时，我们和许多 Moscow 的社会学家讨论了质化的议题。他们坚

持在俄罗斯没有社会学家，只有田野研究者。社会学分列成社会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社会哲学家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社会学家，并其实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型到西方社会哲学，非常顺利。他们对经验完全不感兴趣。社会科学家则坚称虽然质化方法（软方法）有些推论的价值，但是只有量化（硬方法）是科学的。可是，我们遇到的年轻社会学家中，特别是俄罗斯来的，其实都对质化方法有兴趣。这或许是资源稀少的关系，因为他们其实很难在 Moscow Institutes 之外拿到研究经费。所以没有人会做质化。但是也因为他们的对于苏联对于量化研究的崇拜和政治化感到厌烦了，所以没人相信政府官方的量化研究，这在年轻一辈的批判学者中特别如此。

而当我们开始我们的计划时候，我们开一个为期 3 天的会议讨论质化方法。那时在 Moscow 的一个传播部的 dom otdykha（渡假小屋）里面，但我们睡在很冷的小木屋里。主要的结论是质化方法必须严谨和系统化。Peter Fairbrother 带领了质化方法技术部份的讨论，指出要有适合和足够的纪录器材去写田野笔记和访谈，这个讨论很令人印象深刻，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掌握了质化的根本原则。

许多我们的研究适用比较个案法，特别是那些工业研究。每一个研究团队负责几个个案，然后汇整。我主持一开始的讨论，所有的研究者来参与，然后决定要访问什么，像是资深经理人、厨师、工人等，以及什么样的调查可以进行，像是参与观察，坐在商店里面或是加入工会。然后我们有一个访问大纲，针对每一个受访者类别，准备一个格式，让大家写报告。这个方式我们尽量去确定所有的个案是在可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每个报告、访谈搞、田野笔记等都跟每个人公开，然后讨论。每个个人公开，然后讨论。记等越会开会一次，团队领导要检视工作进度；然后每年有一个大会议要去形成假设的论证，去测试每个个案。最后的会议每个计划都要是以分析性的文章出现，然后以此用俄文或是英文出版。

我很怀疑若是没有质化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洞见。人们都知道在苏联和俄国时代是怎样，可是现在这个知识并没有被系统化的整理和纪录。若没有质化，我们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不知道问卷怎么设计，怎么解释数据。量化只可以提供最后阶段的分析，

让我们去找推论我们的发现。我们不反对量化，但是我们很怀疑现有的不反对量化，但是我们很怀疑现有，俄国量化资料有多么可行，特别是我们许多研究者帮政府收集过数据，知道那些数据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而且我们发现了很多资料上的不一致性。

我对于现有资料的不满意促使我去找资源支持我们自己做劳动市场调查。主要是在1998年的4个核心地区，由Valery Yakubovich所主持，有很严谨的抽象、访谈、检验。

**Sarah:** 你和 ISITO 合作相当多产，出版了18本书和55篇英文文章，也有无数的俄国出版品。其中最让你兴奋的是什么？

**SC:** 一开始我们研究新工人在转型期间成为领导的这个现象，而也想找出支持民主和工会与工人运动的机制。我想许多研究发现其实是令人沮丧而非高兴的。因为在苏联解体的集体亢奋之后，任何事情都被认为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必须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国后而且拒绝改变其伤害人民生活之前，去面对我们的幼稚想象。因为那些希望多半是象征性的，根本没有实质影响，特别是传统工会。而新的工会也腐败了。当然还有其他反抗的个体，可是也很快就在压迫下瓦解了。

多数的研究很严谨的建立再过去的经验和观察上，但是还是有很多新的发现。我们其中一个计划是问什么让俄国工人努力工作？Sergei Alashev 的假设是“俄国工人喜欢工作”，一听到或许觉得好笑，可是他出版的文章 (Management and Industry in Russia: Formal and Informal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1995) 有很棒的解释。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我想最有趣的发现，包括了苏联文化的实做脉络，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被很多人也看到了。我们的研究特别关注工会、工业管理、零售商的文化，但是这些现象可以在传统国家结构的再建构上都可以看得到。

有些很惊讶的发现是从1998的家户经济调查而来，那里有质量很高的量化数据可以验证很多假设。其中一个发现是 Kermerovo 的 Lena Varshavskaya 发现的，家庭农业并非外界所宣称的是穷人的终身工作，因为家庭农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使得根本入不敷出，反而和连续性论证一致的是，那是休闲活动，反应了苏联的伦理、自然的理念、以及交换的传统。

另外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制度对于市场如

何决定工资差异的支配。这发现强烈支持传统的工业关系主张，反对劳动经济学者的论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国内有给和无给劳工的差异。对我来说，因为我曾经是经济学家，这些是我很满意的发现，因为我觉得主要的社会科学则认识是去挑战古典经济学的虚假科学外衣，去掀开其危险的预设。

**Valery:** 那 ISITO 现在的情况呢？

**SC:** ISITO 是一个历经液态化的组织，因为俄国对于管理和财务的报告要求非常花钱和花时间，但是非正式的连结还在。某些意义上，ISITO 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者。成员变成了顶尖研究和教学的抢手人才，多数人还是持续其研究。我们在今年3月会有最后一场 ISITO 的会议，可能会在埃及。ISITO 的出版品可以到这里：[www.warwick.ac.uk/russia](http://www.warwick.ac.uk/russia)



# > 超越社会学

by Alain Tourain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法国, ISA副会长, 1974-78

40多年来，Alain Touraine是社会学里的大师级人物。他从工业社会学出发，然后在社会运动理论里大放异彩。他的研究认为社会是集体自我创立的，这观点启发了许多新的社会学介入方法论。他也是具有全球观点的社会学家，总是关心世界各个角落的自由与尊严的社会运动。他著作等身，包括了The May Movement of Utopian Communism (1968),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69); The Production of Society (1973), The Voice and the Eye (1978), Solidarity: The Analysis of a Social Movement: Poland 1980-1981 (1983) (with François Dubet, Michel Wieviorka and Jan Strzelecki), The Return of the Actor (1984), 和最近的The End of Societies。他在EHESS设立了自己的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Intervention，并训练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Alain Touraine.

**我**对社会学的初衷，也是长期以来的信念，其实就是来自于对学校教育的不满。学校体系只注重如何维护和再生产其本身的规范，却对如何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不太在乎。我是个特例，我在学校不高兴也不成功，最后拒绝联考，于是进入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在两年过后，我离开了这间好学校，在中欧花了一年，当一个兼职的煤矿工。

Georges Friedmann 欧洲工业社会学的主要建立者，他邀请我加入一个团体，

而那些主要研究职业如何在不同的工业与科技下变迁。他让我负责法国的汽车公司：Renault。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学习整个工作的细节和组织的结构，到过每一个厂房。同时，我通过了考试成为了历史教授，不过因为 Friedmann 我也成为了社会学的全职研究者。他很礼貌成为了的貌成为了告诉成不论我在那个考试失败或成功，我都会给你这份研究工作，因为我们需要新血的加入。

在几年后离开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到了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等校，并在智利住了一年，那里我创立了工业社会学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我和一位智利生物学家结婚了。那时我 34 岁，已经是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的正教授。我接下来的学术生涯都在此度过，除了几年我到过拉丁美洲，UCLA, Berkeley, 纽约的 New School。

1966 年我对体制学术系统的敌意让我加入了 University of Nanterre，那在靠近巴黎的地方。我当时并没有了解到我正处于学生运动的核心，而且这个运动转变了欧洲，成为了一场文化和政治的历

>>



史重头戏。在关于这场运动的书籍之中，我想我的是最深受喜害的，因为我把这个运动当作是 1964 年后在 Berkeley 的言论自由运动之后最重要的运动，这是文化运动，而非社会运动。同时，我强调这个文化运动和正统马克思运动之间的差别和矛盾，特别是托洛斯基和毛主义的诠释观点。我说这种是旧瓶装新酒。所以我开始和保守教授和左派教授产生矛盾，可是我同意 Daniel Cohn-Bendit，他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共知识分子，他在 Nanterre 对我影响最大。

我开始相信集体行动不可以从对于法律、传统、支配价值的同意或不同意去定义之。这让我开始了两项新的研究理论。第一个理论主张是去研究集体行动。我不透过问卷访谈，而透过参与，透过和运动者辩论，和支持者辩论，甚至和对手辩论。这是我在 Nanterre 后研究一个反核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运动、工会运动的方式。这也变成我的乐趣，我参加了 1980-81 的波兰团结工联，智利煤矿和钢铁工会运动，我很高兴。最近我和朋友参加墨西哥 Chiapas 的 Zapatista 运动。每个案例中我都会让运动参与者知道冲突最有可能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方法很显然反对功能论者的看法，把行动和系统看成是一体两面。反之，我的第二个理论主张，就是我越来越相信：社会系统的逻辑和行动者的逻辑，或是说，那些达到高层次的创意和批判介入的行动，其实是相互矛盾的。系统寻求自身的整合和调整去面对外在与内在的变化，而行动者想要增加自身的自由度、自主性、尊严、责任。所以系统和行动者的冲突当然就会不断上演。可是在社会中，若是内部控制系统很弱，然后环境不断变化，系统和行动者的逻辑就会经常出现矛盾，尽管我们不断地创新操弄民意的方式，还是一样。所以全球化造成了高度复杂性，也造成各种冲突矛盾。

我们都知道社会学是诞生于工业社会中，这个社会有能力转变环境和自身，并透过创造新的生产、组织、分配、消费模式，利用社会和经济资源作为手段而达成目标。现在，社会第一次有办法把自己看作有能力去转变自己。这就是涂尔干的基本主张：用社会事实去解释社会事实。

第二个转变也一样重要，就是理性化和市场化。这个逻辑不仅支配了生产，也影响了沟通和再现。所以社会和经济行动者就会从新的领域中被剔除。行动者便得越来越没有能动性，以致于只剩下工具理性。

今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去理解社会情境和社会行动者如何和过往的工业社会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看到威权政府的出现；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怎么在 1929 和在 2007-2008 年被金融资本所取代。金融资本主义没有经济的作用，完全只是钱滚钱的游戏。行动者只可以用普世价值去对抗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完全没有出路。当人权的概念无法捕捉到战后的想象力时，我们看到现在反而是人权和民主有办法去产生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去反对威权和资本主义。

我们面对典型的工业社会是既遥远又具有可能性。21 世纪开始于 1989 年柏林围墙倒塌，以及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然后我们看到的阿拉伯之春。民主的种子在各地撒下，出现新的力量。最近我试着去分析这个大的趋势转变，并写一本书，叫做 The End of Societies。意思是指出代表自身去思考和行动的“社会”已经消失了，社会学家必须承认社会的概念不再等同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而社会学虽然可以也被称作“政治伦理”，但社会科学不会消失。



# > 法律与社会学 的对话

by Kalpana Kannabiran, Council for Social Development, Hyderabad, 印度, 横滨大会计划委员会委员, 2014, 女性与社会委员会 (RC32)

Kalpana Kannabiran是社会学教授，同时也是Hyderabad社会发展委员会的执行长。这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由印度社会科学委员会支持。她2003年获颁VKRV Rao Prize，表彰其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成就。她同时也是建立NALSAR University of Law的创始者之一。在那里她教社会学和法律已经10年了，从1999-2009。此外，她也是Asmita Resource Centre for Women的创始者，于1991年设立。其作品主要关怀非歧视、施加女性的暴力、合宪性、社会正义等等议题的社会面向。最近的一本书是Tools of Justice: Non-Discrimination and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Routledge, New Delhi, 2012)。在2012年获得了Amartya Sen Award表彰在法学的社会科学研究贡献。

9



Kalpana Kannabiran.

>>

我是在 Hyderabad 念大学的时候开始读社会学的，那时是 1970 年代。不过我其实那时不太知道社会学是什么。经济学那时不太知道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地理学这三者和其他学科，像是文学、心理学、哲学等等不太一样，我知道我不喜欢后者，但是又不是很清楚前者。总之我就是去读了。我上了一间国立大学，叫做 Nizam College in Osmania University。从那里毕业后我就到 University of Hyderabad 去工读硕士和博士预备课程，后来到 Jawaharlal Nehru 去读博士。大学教育在我那时候是很乏味的，乏味到你完全无法想象，硕士也是。

不过很幸运的，我在大学第二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女性主义团体有了很深的接触。这个团体叫做 Stree Shakti Sanghatana，是一个对抗暴力和强暴的组织。我开始学习关于这个运动的一切，包括公民自由等，因为那时她们正在和后紧急时代的国家对抗 (1977-1985)。我很庆幸我可以近距离认识这个团体，认识公民自由，而我爸爸那时是律师，是 Andhra Pradesh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 的理事长，后来是 Peoples Union for Civil Liberties 的理事长。而我妈妈是作家与诗人，是只持公民自由运动的批判家，也让很多运动人士到我们家里。她也是 Stree Shakti Sanghatana 的成员，

也是 We Were Making History: Life Stories of Women in the Telangana People's Struggle 一书的共同作者。

见证这段历史的经验成为了我了解社会学的最佳敲门砖，也让我了解到社会的不同与可能。从那个运动中我开始去认真看待社会，特别是从法律和激进政治的面向。不只是法律社会学，而是法律与社会学。我认为这两个学科应该相互对话，才可以让我们对正义有更深刻的认识。我对这两个学科连结的兴趣或许也来自于我在博士预备班时我的指导教授和她丈夫“意外”过逝有关（她才 30 岁，老公也是该系教授），起因于家中失火，留下一个 2 岁的小孩。我是她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学生兼朋友。而那个时代其实我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社会学，我是在校外学到了很多，但是我的老师们也都对我参加社运很苦恼。

我投身于政治和组织的经验让我有机会熟悉法庭辩论和法律诠释策略，也让我很早就去研究个案法、宪法、集会自由辩论、立法辩论等等。但是我也对宪法主义有兴趣。社会和政治运动如何代表宪法？运动如何以宪法主义组织起来？什么样的立法过程让运动开始和产生影响？2006 年的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Traditional Forest Dwellers (Recognition of Forest Rights) Act 就是一个例子。运动中的双向关系让宪法有能力反对

国家对人权的迫害。而国家和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也相当有趣，像是研究最近 2012 年的新的性骚扰法案就是另外一个例证。换句话说，若我们把正义放在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那么法律就是这个中心的环境。

我当然不满意做一位只是关心法律议题的社会学家。我是一个女权组织 Asmita 的共同创始者，于 1991 年创立。我是咨询者的角色，提供咨询给那些受家暴的妇女。即使我是一个社会学博士生，熟悉法律，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从律师那边得到答案。为了把这个专业的障碍拿开，我去念了法学，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我不要再继续走法律的原因是我想不到法庭中去重复律师、法官等总是在做的事情：用法律解释一般常识。我想要对基本的权利有更多的认识，而不是在法条上玩文字游戏，化约真实状况。然而，我更专住在怎么帮助人们解除痛苦。

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惊讶社会学家对法律的认识相当有限。虽然很多社会学家对法律很感兴趣，但是了解实在不深。尽管早期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对于法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很深，像是 Malinowski, Durkheim 和 Weber，可是在印度，社会学并非如此。很大一部份的印度社会学是研究卡司特体系，然后研究意识形态和结构怎么再生产，怎么生产支配关系等等，都是

从情境理论、从支配者的角度出发。要改变这个传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现在我们开始慢慢看到不一样的论点了。

我的研究就是上述从这些思考 and 传统开始的。所以，一部分是研究犯罪法学的历史成因以及在殖民时代的发展，以及怎么演变成今天的性骚扰、性工作、死刑、同志行为的罪行化等等。这个聚焦在法律的 sociology 研究立法的政治、法庭、法律诠释，增进我们对于意识形态如何作用在社会上，如何支配，如何影响法律裁判、如何侵害基本人权等等的认识。而且这个领域也关心社会和法律取得的关系。

第二大我感兴趣的领域是暴力。当我在研究性别、卡司特、失能、弱势者（性别和宗教）的时候，我开始注意歧视、违反自

由、暴力的三角关系。我特别对于理论策略和可能对于宪法诠释的影响感兴趣，看自由权利怎么被侵害，怎么造成歧视，像是“不可触及性”（卡司特）、性控制（女性）、强迫迁徙（部落）、大屠杀暴力和贫民窟化（宗教少数）、无障碍空间和拒绝进入（残障者）。社会转变的概念要怎么和革命暴力、甘地非暴力、Ambedkar 的反抗卡司特做结合呢。作为宪法的设计者和反卡司特的哲学家，Ambedkar 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却是被主流学院排拒在外。我们如何复苏一种知识的历史，让这个历史和宪法结合呢？■



# > 智利政变后 40年

## 访谈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 Part2: 民主转型的挑战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宣读新宪法宣言  
(2013年7月)。

这个访谈聚焦在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如何看待独裁对民主的影响。在学术生涯之外，他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开始于 1964 年于 Catholic University 学生会长的选举。在读采统治期间他著述和教课，但都在学院之外，也训练了好几代没有什么机会取得教育资源的学生。他也参与了重建社会民主的计划，辩论民主转型，也是教育部、文化部的顾问，还有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近年来他致力于新宪法的推度。他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学家是密不可分的。

布：在上一期 (GD3.5) 的访谈里面，你谈到了 Salvador Allende 和 Unidad Popular 的

失败，特别是理论的失败。让我们回到独裁垮台的问题上。这是怎么发生的，又如何发生？

MAG：让我们从厘清问题开始把。Unidad Popular 的失败并没有造成卡台，但是民权和军队的阴谋才是。这些都是美国暗中支持的。在 1980 年代的独裁政府制定了一部全新的宪法，造成了两种政治秩序。第一是从 80 年到 88 年，第二是从 88 年之后。第一个是独裁的体制化，并且有宪法的支持。第二种是一种威权的民选政府，军队具有否决权。你要称限制的民主、受保护的民主等等，都好。但是为了要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然后又要维持权力，Pinochet 必须要有些作法。

>>

布：这就是公民投票进入的时间点吗？

MAG：是的。他们选择公民投票的机制，但是这个开启了一个问题。第一，反对派发展出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反抗和持续的组织，让人民参与。第二，这组织也让不同的反对声音集结起来，并且快速的转变了社会地景，像是若化工会等等。而 82-83 的经济危机开启了一连串的抗争循环，让人民聚集在一起，一起克服恐惧和形成政治影响力。但是没有任何的意见被提出来说要如何打倒独裁。暗杀的计划也失败了。直到独裁政府举行公民投票企图为 Pinochet 巩固权利，反对党却没有任何对策。虽然接受是很困难的，不过反对党最终接受公民投票，而右派的支持者则说公民投票是错误的一步，因为让反对派有机可趁。他们只知道怎么胜选！

尽管这些政治上的操弄，反对意见还是多数。所以想要巩固权力的公民投票显然并不可行。而反对派只要有 no 的选项，那么未来不怕没有仗打。

布：这是个奇怪的独裁终结形式：自杀。而公民投票迈向民主的结果为何？

MAG：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赶走独裁，但没有废除制度架构和经济模式。这很重要，因为这是唯一世界上的国家在独裁垮台之后却没有制定新宪法的国家。这也是唯一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宪法委员会的国家。

但是这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赢得公民投票之后和选举，统治联盟可以不用害怕威权威胁而改变政治体制。

布：历经了这样的政治转变，最后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了吗？

MAG：你不太可能在不改变政治的情况下改变经济。例如，你不可能在现在的宪法下建立一个国营企业。记得，这是一个纯粹的新自由主义，因为这是独裁的规划。现在，20 年过去了，我们看到 Concertación 赢了 19 次选举，让国家的 GDP 从 \$5000 到 \$15000，然后，有 70% 的大学生其父亲是没有高等教育学位的。这都是因为经济转变的缘故。

所以 Concertación 说：听好，我们做得不差，已经很成功了，所以为什么还要改变？我们已经把智利民主化了，而这也的确是大成就。此外，他们宣称要矫正新自由主义。可是他们巩固新自由主义，重新正当

化。换句话说，他们失败了，不能和 Pinochet 切割。社会经济的模式还是老样子，不民主。政治或许民主，但是政府一点也不民主。

布：你的意思是？怎样可以在非民主政府下实行民主政治？听起来像是列宁主义！

MAG：我的意思是，第一，宪法从来没有被民主方式通过。所以这不具正当性。但是第二点，宪法开创了一个政治体系，体系中支持独裁的少数和反对的多数拥有一样的选举权。这个选举系统让选民很难在同一个政党中选出两个候选人，即使该政党拥有多数票。所以立法委员总是很分裂，但是改变宪法又要 75% 的同意，所以很难。那这到底是什么宪法？这是一个维持经济体制的宪法，只有一行关于生命权，确有 3 页关于财产权。

布：所以社会经济秩序怎么个糟法？看起来应该是往好的方向才是？

MAG：我想那是一个绝对的失败。只要关于经济模式，没有一件好事情。这是因为铜的价格，因为 Concertación 攻击贫穷。解决经济危机并不是靠这个经济模式，而是政府的对抗循环政策。

布：模式没有不好，而是结果？

MAG：不，不，不是这样。在 70 年代智利有世界上第二平均的收入分配，我指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间。2000 年却变成了第二最不平等的国家，仅次于巴西而已（乌拉圭或许最平等）。收入分配是世界最差的几个，最好的是瑞典。第二，没有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比智利更隔离排挤的，你会看到居住、阶级、收入等等都是很显著的因素。在 70 年代，可以确定的是，75% 的学生在公立学校，现在只有 35%。所以你没有社会，有的是市场，和国家的一些管制。这里有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一个断裂，所以若是中国和铜矿不见了，整个国家就不见了。这个模式是以出口为导向，出口货物，也出口债。劳动关系也是世界上很差的。只有 8% 的劳动力有集体议价的权利。这也是最不管原住民 Mapuche 的国家，没有政策。最后，这是很爱抗忧郁药物的国家。

布：但你不是早先说贫穷已经不是问题了吗？

MAG：若标准的方法被采用的话，贫穷会从 50% 下降到 15%，可是你知道的，人们今天不穷的，可能明天就掉到贫穷线以下了，这根本没有社会保护可言，

布：好，我想你已经辩护得很清楚了。现在让我们谈谈学生运动。什么样的程度这代表了不平等？什么样的程度学生有自己的政治议程？

MAG：对于学生运动有几种诠释。有人说那是中产阶级运动。学生不满意，所以上街头，要求更多。不满是社会运动一个很重要的面向，但是这没办法解释什么。若我们谈论不满，那他们的家长会最不高兴，因为他们要帮他们的孩子付学费。

最重要的学生要求是公共教育，包括三个元素。第一，公共教育系统必须是多数受会的。你可以有私立教育，但是要管制。第二，法律必须禁止营利学校，禁止营利企业对于教育的介入。第三是要求免费的高等教育，停止补助私立高等教育。

可是你不行对所有人开放免费教育却没有收税配套改革。若是布尔乔亚的小孩也是免费上学，那只能是他们有缴税。这一来需要改革经济架构，也意味着要改政治制度才行。

布：所以你说这是革命的需求吗？

MAG：我称这是基本需求，这和要求更好生活不同。我认为学生运动在智利也是扮演一样的角色，没有跟政府与政党接触，这和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一样，叫做去打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所以这个意义之下，是可以称作“革命”。可是在方法的意义，这不是革命。其他的基本面向是这个学生运动是第一个当代的社会运动，是智利历史上的第一次。

布：所以私有化教育是以经济模式为基础，无法改变，除非够过宪法和体制。而这样的改变需要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建立。可是看看已经在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方式，那会把后 Pinochet 时代带到更民主的方向上吗？

MAG：在智利所有的历史计划都是透过政党和运动的连结：像是工业化是由人民前线（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提出，农业改格式由基督民主党（教会和农民运动），社会主义是由 Unidad Popular（社会党、共产党、其他）提出。对于独裁的抵抗则是由 Concertación 党和共产党一起，可是现在这个联合已经没有办法深化民主了。有些新的运动出现又失败了。最近的总统大选或许又有些新希望。Michelle Bachelet 被多数支持选上，而且她的主张就是制定新宪法。而多数支持选上，而且她的主张就是制定新宪法。她和其他社会运动的结合或许可以带来更民主的参与和制度的创新，让公投制宪有可能。新的民主宪法和宪法委员会将可以带来政治和社会的新连结，创造新的政党，等等。

布：你 40 年的经验真的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对我和对读者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谢谢你！ ■



# > 乌拉圭

## 拉丁美洲的先锋

by Felipe Arocena,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乌拉圭



在Montevideo的议会外要求大麻合法化。

15

**乌**拉圭是小国，只有 3 百万人，但是两项法案的通过震惊了全世界：同志婚姻和大麻合法。若是 2012 年的堕胎合法也算进去，那你要说这个国家不是在西方的前面那就说不过去了。

按照“婚姻平等法”的第一项，“婚姻是异性或是同性的两人的永远结合”。在 2013 年 8 月我们见证了第一对男同志的婚姻，接下来有更多对同志结婚。除了乌拉圭之外，两个其他的南

美国家也有同志婚姻，那就是巴西和阿根廷。而其他 12 个国家也是，包括了瑞典了也是、挪威、法国、西班牙、冰岛、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单派、葡萄牙、加拿大、南非。多数是西欧国家。在墨西哥、美国、英国，这个法律只在部份地区有效。所以，若是用 José Guilherme Merquior 的分类来说，我们若说拉丁美洲是“另外一个西方”，同志婚姻是典型西方的产物，因为这个区域的世俗化、现代化、权利普

及。

“大麻管制法”在 2013 年通过了。这个法案说“国家法案说国家会负责大麻的控制、管制、进口、出口、种植、收成、制造、使用、储存、贩卖、流通。”大麻种植和家庭种植，每个家庭 6 个种植地，也都是合法的。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项乌拉圭这样把大麻交给政府管理的。所以可能的影响有两个。第一，可以把大麻和其他毒品区隔开来，也把相关的暴力阻隔开来。第二，

>>

这其实也是对抗毒品的一个策略。乌拉圭总统 José Mujica 认为若长久以来的方案没有办法解决毒品问题，那么应该换换新的方式，若是乌拉圭实验证明了有好的成效，那么其他美国国家组织联盟 (OAS) 那些也在试试新方法的，或许也会考虑跟进。

在 2012 年乌拉圭通过了“自愿中止怀孕”法案，其第二项说：“在前 12 周前，自愿中止怀孕并不犯法。”乌拉圭是拉美少数国家允许女性堕胎的（其他有古巴、圭亚那、波多黎各、墨西哥）。女人的意愿就是充足的理由。5 年前议会也批准了这个法案，但是前总统 Tabaré Vázquez 同时也是肿瘤学者反对。在辩论之中，两个点很重要。第一，女性的堕胎权利；第二，地下堕胎医院对于经济弱势女性的影响。

这三个法案通过了，因为执政的 Frente Amplio (Broad Front) 政党拥有绝对的国会多数。这个政党其实是个联盟，包括中间到左派都有，是在 1971 年成立的，2005 年第一次执政，2010 又连任。同时，这些法案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支持。当婚姻平等法的到多数立委的支持时，其他两个法案则比较争议，有半数反对。这个其实反应了人口的组成。

法案很明显的反应的国家的左派政府施政，而过去 8 年来因为拥有立法多数，也使得可以通过许多法案。但是这个可能是个过于表面的解释。一个更深层的社会学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总是被认为文化保守的国家和拉美人口最为老化的国度呢？

有至少 4 个相关的因素。首先，乌拉圭社会是世界上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历史学家 Carlos Real de Azúa 说过乌拉圭是拉丁美洲旧基督教天空中最黯淡的一颗星星。第二，这个国家已经在 20 世纪就有许多进步前卫的法案通过，像是 1907 的废除死刑、1913 的女人离婚权、1915 的 8 小时工时、1927 的女性投票权。这个国家已经走得很前面了，使得许多国家害怕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即使人口老化，大部分的老人都是在 60 年代进步时代的小孩。第四，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来都很正面发展，像是政治民主的完善，经济成长率在过去 10 年每年 5%，然后社会平等和贫穷减少，这归因于成功的重分配社会政策。乌拉圭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很有可能是在不久的将来，许多西方国家将会通过许多我们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法案，如此一来要说乌拉圭

是人权的先锋其实一点也没错。同时，这些法律会遇到阻碍，也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而遇到的阻碍会有所不同，这将是很难解决的棘手问题。■

# > 乌拉圭的公共教育有多么公共？

by Adriana Marrero,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乌拉圭, ISA教育社会学委员会委员 (RC04), 社会理论 (RC16), 人与社会(RC32), 和Leandro Pereira,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乌拉圭



乌拉圭的议会外的抗议教师。

**乌**拉圭有 80% 到 90% 的学生上公立学校。是的，你没看错。私立学校比例不到 15%，这个数字变化不大。公共教育是免费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到硕士和博士。除了免费之外，大学教育是公开的，并没有考试或是名额的限制和排除机制，所以所有的高中生的可以注册入学。此外，尽管拉丁美洲的宗教普片，乌拉圭的公共教育是与宗教无关的，这从 1917 年就开始了，在 9 年级时，宗教课程是选修，可以不要选。还有，乌拉圭的女性比男性要有好学业表现，这个现象在新世纪一开始就如此了。现今的女性平均教育程度高过于男性。女性也占了 4 分之 3 的大学生比例，研究所则更高。这种教育的“天堂”也是第一个采用 MIT 的“人人一台笔电”计划，让每一个老师和学生可以获得一台笔电，免费连到国家的网络。现在连中等教育也纳入

了。和乌拉圭的国花齐名 (ceibo)，所谓的“ceibal plan”让每一个贫穷小孩都可以把笔电带回家，学习、分享、娱乐。

你或许会假设这样的免费、公共、公开的教育系统只适用在低人口成长的国家 (0.19%) 以及 22% 的人在 15 岁以下，然后气候条件要好，没有地理和文化的内部隔阂，这一切才有可能提供这么好的教育。但是这并非事实。

按照 2012 年 PISA (全球学生评量数据库) 的乌拉圭报告，“乌拉圭的不平等还是相当严重”。89% 的学生在非常不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学习 (level 2)，只有 13% 的学生除外。贫富差距所造成的成绩差距，以数学为例，差了 170 分，这反应了很大的教育不平等。这项结果在 4 个循环的测量中是很明显的。



简单地说，最富有的学生平均成绩是比挪威 (489) 或是美国 (481) 还高的，但是最穷的学生成绩比卡达 (376)、印度尼西亚 (375)、秘鲁 (369) 还低。更令人惊讶的是，高分的学生有 75% 来自私立学校。

若是 PISA 的数据不够让你信服的话，我们可以来看看国内的数据。是的，全球比较有可能不太有用，但是看看国内的数据，发现越高的教育程度排除掉了越多穷学生，这是因为有很高比例的辍学和留级生。根据 2012 年官方的家户统计资料，有 95.3% 的 6-11 岁的小孩上小学，73.8% 的 12-14 岁小孩上中学，只有 51.1% 的 15-17 岁小孩上高中。最后，只有 23.7% 的 18-24 岁年轻人上大学。而若考虑收入的话，这个减少的趋势是一样的，3 岁的小孩中，最富有的家庭 10 个有 9 个上学，但是最穷的人只有 50%。22 岁之前的年轻人，富有家庭小孩有 57% 上学，而穷家庭只有 9%。

所以到底那里出了错？为什么这样以平等公平为原则的教育体系会造成这种不正义的后果呢？

我想问题在于“公共”的意义。乌拉圭的“公共教育”事实上并不是民主意义下的公共。所有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两个机构所管理的，其一是公共教育部，其二是共和大学。这两个和政治是独立开来的。虽然有行政院下有教育部，可是对教育却没有管辖权。即使宪法有说主权以民族为基础，并且每 5 年有大选，可是乌拉圭人民对于教育没有过问空间，不论通过立法院或是行政院都是如此。

同时，那些主导教育的两个机构在宪法之外有很大的自主性，而且被企业利益所主导。公共教育部负责义务教育和教师培训，但是素质却很差，形同虚设。另外一方面，教师培训仍然照着传统的方式在走，完全没有创新。此外，升迁以年资为主，完全没有评鉴机制。而教师的聘用被该部门完全垄断。不管怎样，老师要被解雇是很难的。

中等教育是整个体制的主要瓶颈，因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课程缩减导因于老师缺席，40% 的学生留级。初等教育中虽然老师足够，可是留级人数也一样很多。2013 年老师要求加薪，可是从左派政府 2005 年以来薪水已经节节高升了，高到起薪已经比教授超出两倍。教师的罢工让许多穷学生没有课可以上。这还不包括其他的罢工，像是反对改革的罢工。这些罢工有些是由左派所发

起的。私立学校付给教师比较少的薪水，也不太理会这些抗议，所以没受到罢工影响太大。从这个观点来看，乌拉圭教育并没有多么“公共”。

在看到这乌拉圭教育在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折冲的特质之后，我们会发现公共教育塑造了乌拉圭的认同，并且让公民不相信市场机制。(2) 而且教师工会导致了一种“重新封建化”过程。在打着“公共教育”的旗帜底下，他们宣称要保护其商业利益，这是一种特权的展现，也是不负责任的象征，因为在面对教育不平等和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是帮凶。完全主导教育政策的工会拒绝外界的批评与讨论。所以，乌拉圭打可以继续赞扬公共教育，只是那一点也不“公共”罢了。■

注 1: “Ceibal” (一群 ceibos) 是“Conectividad Educativa de Informática Básica para el Aprendizaje en Línea”的缩写，叫做“信息科技的在线基本教育链接”。

注 2: 1993 年正值私有化的时代，有 72% 的乌拉圭投票反对公营企业私有化。

# > 乌拉圭奇迹

## 重分配与工会成长

by Marcos Supervielle,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乌拉圭, ISA劳工委员会 (RC30)委员, and Mariela Quinones,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乌拉圭

**第**二个左派乌拉圭政府于 2009 当选执政，期支持劳工的政策最主要就是透过工资委员会和三方系统去提高所有职业的最低基本工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执政党相当的具有策略性去推动收入重分配。最近几年下来实质公司提高了 4%，最低工资则增加了 250%。在 2004 年的左派政府之前，平均薪水是最低工资的 6.5 倍，现在则是 3 倍。和常识相反的是，常识认为重分配政策减少了就业，可是这里我们看到失业率从 13.7% 降到 2004 年的 6.1% 了。

再者，工作也在这个时期增加了起来。非正式劳动减少了，而社会安全的人数增加了，劳动权利更多人享有。全职劳动所

伴随的其他好处，像是好的工作，从 55% 增加到 2001 年的 69%。在这段期间，青年就业也增加，罢工减少。那些公共工人总是被连结到公共支出的投票，私人劳动人连结到集体议价的限制，不过更广泛的说，劳动冲突的确减少了。

所有这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好的经济环境。如此条件式增进社会重分配的必要条件，可是并不充分。增进平等是需要强大的政治意志，特别是那些重要的政策，例如过去就把贫穷人口从 40% 减到 12%，而赤贫则从 4.5% 到 0.5%。

我们注意到的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是工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

很久的历史了，并且在第一个左派政府被重新规划，然而成为政策制定很重要的一环。的确，工会率从 2005 年成长了 300%，而到达了 350000 的人数，2013 年则估计会有 380000，这是 12% 的总人口，或是 24% 的受薪阶级。所以不只会员人数大量增加，还有新的工会出现，像是农业。

这个工会的成长有许多结果。一方面产生了许多古典的工会意识形态。传统上，乌拉圭的工会和国家与企业是分开的，和政党也是，左派政党也不例外。后者的影响是透国左派领导的决心，透过民主选举，便得有权力。其他的工会传统是说每个公司都有工会，把工会转变成微观的政治系统，并和在地议题结合。结果，中央

的乌拉圭工会 (PIT-CNT) 总是包括了各种工会，虽然说全部都是左派就是了。

透过民主选举，工会主义流失了政治的一致性，特别表现在领导上，并没有把自己和历史上的左派连结在一起。在意识形态的层次，在某些部门里面，激进工会出现且发展出很强的反政府批判。在其他产业，企业修辞遍布，把现代化国家和改善最低阶级处境分开了，新的工会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很有侵略性，并且似乎正在改变工会主义本身，还挑战了新的图像和创造了新的关系。实际上，一个新的企业复仇已经发展出来，甚至成为有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或许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左派，正在传统的工会框架下运作，也

有可能开创新的结构，给新的社会事业，并以劳动世界为基础。■



# > 乌拉圭

## 农业革命

by Diego E. Piñeiro,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Montevideo, 乌拉圭



今日的生质能源，明日的饥饿？

**在**2002年，一场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撼动了乌拉圭。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的第20年。这一切是由传统的政党所领导。2005年，左派的 Frente Amplio (Broad Front 党) 赢得了大选，于是开始重建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国内经济增长飞快，是拉美最快的国家，而重分配政策则是要削减贫穷现象，也相当成功。许多的成绩是由于农业部门的快速成长，因为在那几年来结构变迁有了彻底的改变。

所以乌拉圭农业社会

的结构在20世纪已经有所改变。在最高峰的时候，拥有许多牲畜和农业设施的人都大力投入出口产品的制造。也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农业的建立，工人提供了许多农业的劳动力。可是，同一时间还有许多规模大的家庭制造业者。农人比佃农多。他们来自欧洲，主要生产内需产品。在新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许多社会结构因为革命而有所改变。以下我会详述。

自从上一个世纪结束之后，世界的食物市场需求也增加了，其他包括了

纤维、员物料等等也是。这个现象让广大的人口兴起成为新经济体。而新的消费者的出现也提高了产品的售价。因为这些食品的高需求量，乌拉圭历经了土地使用的紧张期，而整个国家也面临的新土地的剥削，用来种植种子和油品种子，而牲畜的产量也增加，导致了出口农产品的增加。这些生产型态其实很传统。而政府的补助始于1987年，现在有超过一百万公顷的森林，还有两处纸浆生产第，都是由跨国公司所经营。其他也随着生质能源的需求而

>>



同了。

这个巨大的转变是由许多过程所导致的，且环环相扣。第一，管制架构的改变让金融资本很容易进入农业里面。第二，组织变迁让公产，特别是网络的企业型态可以把资本更有效的流通。第三，农业工作被外包到许多协力公司，他们有机器，然后利用期社会网络去雇用劳工。第四，科技变迁增加了生产者对于改造种子的依赖，还有化学肥料、以及新的机器。畜牧业里就是使用疫苗等等维持动物健康的方式。

同时，新的信息和通讯科技（计算机、网络、手机）也改变了农业公司的管理。这些把劳动力的组织改变了，把劳工和串连起来，连结到都市，改变了国家和都市的文化边界。这种农业结构的转变和农业人口创造了新的行动者和联盟，要求国家和农业可以更民主、更平等、更永续。■

被产出，主要由国家的石油公司掌控。

土地价格提供了很好的指标来衡量农业的变迁。在过去10年里面，土地的平均价格增加了7倍；最大的田地（超过2500公顷）则增加12倍。这让大或小的生产者都卖掉了土地。结果就是成长的集中和土地被外国公司所把持。一项从2011年的农业调查资料里面看到2000年时，57131笔的农业土地到了11年之后只有44890笔。即使91%的12241笔消失的土地小于100公顷，可是显现出的是小农的减少和地方畜牧

业的消失。

新地主的巩固有绝对的文化影响力，这和国外拥有者增加无关。上述的数据也显示了：虽然90%的乌拉圭土地在2000年是私人持有，11年后却剩下54%。在2011年以前，43%的乌拉圭土地由法人持有，这些都是外国人或是跨国公司。

因此，我们从畜牧农业到了现在的种植业，生质能源，然后被大企业所占领，被机器所取代，大量的农业人口出走到城市，土地的高度集中，外国资本等等，今日的农业已经和半个世纪前大不相



# > 匈牙利

## 的黑帮社会

by György Csepeli,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匈牙利



在受欢迎的Hetí Világgazdaság (World Economy Weekly)的封面上，执政党 (Fidesz) 被描绘为黑道。

者中沒有人期待可以轉型到新的秩序。一般人當人不期待改變，特別對於那些生意人和失業者來說，非選項之一。

在那些后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匈牙利是以农业经济企业最为著名的。Ivan Szelenyi 的书 *Socialist Entrepreneurs* 中，在国家社会主义匈牙利有约 10% 的人口是从事企业工作。然而企业家精神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说不但被允许还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的。Szelenyi 的“中斷的布爾喬亞化”是錯的。前社會主義企業家馬上認識到新的企業精神太過於冒險，而且多數會失敗。成功不過是偶然，不是實力。許多新的後社會主義企業家模式並非來自前社會主義企業家，而是高階

23

过去 20 多年来，也就是从 1989 的 *annus mirabili* 事件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也就是这之后，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出现了。当 Michael Burawoy 和 Katherine Verdery 在

*Uncertain Transition* 寫下導言時，觀察家對於這個歷史的詮釋相當歧異，分為“歷史終結”的大敘事和“新穎且未知的後現代性”這兩派。不過這兩種理論都不符合現狀。

除了幾位激進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人之外，當事

>>



黨幹那裡。

工人阶级或是中产及党干部之中的许多人都要面临失业。1.5 百万的前破产国家经济的受雇者因为从亏损经济转型到剩余经济而丢掉工作。收入和消费的差距越来越大，近几年更是如此。边缘化的人口包括了 Roma 人，老人等住在很远的乡村区域，无住屋者早已绝望。族群和区域的不平等是重迭的现象，导致了贫民窟出现在北匈牙利。歧视和贫穷文化使得 Roma 人处于痛苦之中。

除了物质的不安全，还有认识上的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是从对外开放各种竞争性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而来。Vaclav Havel 著名的住在社會主義裡的水果商所多：“活在謊言之中就是活在往言之中”。不論掌權者或是無權者，社會主義的相信者和反對者都認為真理與非真理是很清楚的，非黑即白。从党国一体到多元体制，是与非的界线不见了，以前社会主义时代的是非已经消失了。人民要在各种真理和谎言中做决定，便得不知所措。思想的自由对于害怕思考的人们来说是个恶梦。

这两种不安全导致了民主的反抗，反抗自由主义。2010 民族主义阵线的压倒性胜利来看，民主败选了。在转型的 25 周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匈牙利会回到国家社会主义，只有这次是以民族社会主义出现。

Bálint Magyar 說過，匈牙利社會可被稱為“黑幫國家”，這個黑幫機器裡面，社會團體非常分化，分裂成互不往來的次團體。或是用社會學的話來說，借用 Mark Granovetter 的理論，強連結的普遍造成了黑幫國家，削減了以若連結為基礎的公民社會。結果就是國家的衰微與經濟的蕭條。

統治者為了要確保執政，黑幫國家的意識形態是民族主義。黑幫掌控國家，而被掌控者給予被統治者的資源就是一種象徵性的資本：民族主義。这个民族主义对抗自由，内外敌人通杀，认为这些敌人是共谋。内部敌人并不需要对抗，因为向来就是犹太人。外部敌人却从因为再也没有土耳其、哈布斯堡王朝、苏联作为敌人而改变了。新的外部敌人在布鲁塞尔。欧盟变成了匈牙利民族主义的敌人。矛盾的是，反欧盟的修辞

故意对欧盟挹注匈牙利的资金视而不见。

黑帮国家生产了三种文化。第一是在内部统治圈圈内的问话。第二种包括了那些信仰黑帮的人，肯买单民族意识形态。这些人可以三家民族族合作组织。他们的热情来自于反共、对于前社会主义不正义不了解的人的收买。第三种文化是包括移民在内所建立起来的，特别在最近几年内发生。Ágnes Hárs 的研究指出，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住在西 Transdanubia ( 鄰接奧國 )，而老人则住在北匈牙利。这种现象促使了移民的流动。

然而对于那些还在匈牙利的人来说，重建社会信任是唯一的出口。换句话说，就是要建立发展社会合作的能力，让彼此不认识的人可以一起合作。这必须打破那些小圈圈的强连结，建立一个充满弱连结的共同体社会。■

# > 当代匈牙利 的阶级命运

by Eszter Bartha, 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Budapest, 匈牙利



萧条的都市，以前充满工人，现在满街流浪狗(Balázs Gárdi)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阶级这个概念是否在后工业社会还有什么意义，或是说，我们学术可以透过把讨论阶级得到什么结果？在论阶级得到什么结果？在东欧，阶级这个概念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非常紧密，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视为统治阶级。

而现实上随着共产主义的迅速瓦解，1989年后所谓的工人阶级历史已经不再受欢迎了。这个事件让马克思主义中把阶级位置和阶级意识等同起来的论述彻底失去正当性。在1989年，有些东欧知识分子还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以工人统治为基础，其他的团体像是改革者，则提倡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有些人宣称社会民主必须以混合经济和强大的工会。另外，也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还包括了工人阶级不会支持资本主义复苏甚至会改革的集体主义替代道路。当然，这个期待错了，而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也没有很强烈的排斥。的确，在东欧没有任何的国家中有工人支持任何的民主社会主义替代道路。东欧政治和知识氛围也没有想要重新审视阶级这一概念的意思，所有的阶级理论

都被认为不再有用，然后工人阶级也总是轻易地被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连在一起。就像知识精英总是想象一个布尔乔亚化的未来一样，忽视工人的社会和政治角色。

那位什么又要在东欧重新审视阶级这个概念呢？所谓的“布尔乔亚化计划”允诺人民一个快速赶上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和普片就业与社会安全。而在社会主义垮台后的20年这个计划似乎便得更清晰了。私有增加了社会不信任的程度，特别是在这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比之前共产主义时还大。工业化带来了失业，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也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西方知识分子把这称为新自由主义对东欧的殖民。

针对什么样的新结构位置可以用来审视现在匈牙利的后社会主义资本经济呢？我们可以这么回答，那就是：和西方潮流一样，工业部门缩减，服务业增加。此外，厂商外移到其他国家加深了西方和东方结构性的不平等。这解释了在匈牙利为什么资本家很少，但是无技术工人很多的原因。Szalai认为一个双重的模型是必要的，因为要几当代匈牙利社会的跨国公司工人和本国厂商的工人。后者工资很少，是被高度剥削的“bricoleurs”，总是非正式的雇佣关系，相当不稳定。而前者可被视为世新劳动的贵族，很少或甚至没有阶级意识：再加上孱弱的工会，这些都显示了匈牙利劳工阶级是如何的成为“自私的阶级”。(1)

可是，这些新的不平等型态在匈牙利没有制度化。“这个市场经济把我们踢走”是我工人阶级受访者的普片心声。工人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相当失望。他们的技术和知识背心的政府轻视，所以他们认识到虽然人们在Kádár政府下不平等，但是不平等却在1989年后增加许多。我的受访者多数抱怨他们的小孩在那些经理、医生、律师等的小孩完全不能比，因为那些人的起跑线比较前面（像

是私人的语言课程、运动课程、舞蹈、滑雪团队等等）。

然而这个对于新政府的批评是错的，没办法成为真正成熟的反资本主义批判。工人典型上仍然期待国家可以保护本劳，避免不公平的国际竞争，把一个强国家和第三条路视为是正面的替代道路。这个反应可以说是因缺乏一个反资本主义公共领域，也因为工人阶级此一概念的破产，另外加上深层历史经济因素所导致。

然而，这种匈牙利的方法也可以在其他西方国家牙利的方法也可以在其他阶级此看到，像是美国：政治腐败、阶级分裂的加深、底层阶级的扩张，工会的弱化等。试想看看以下这个情况是否可能：后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的缩影，意味着全球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相似性，加深了劳工之间的族群和民粹意识形态呢？在后工业社会里，加上企业文化、天赋、成就、努力等因素决定了社会向上流动，以至于平等竞争变成一种社会可接受的不平等。这同时也是后社会主义资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比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来更多的幻灭。首先要知道的是，竞争从来就不平等；第二，由资本主义无情造成的社会和物质的不平等不再被人民接受。的确，许多人会用寡头治理去交换社会正义。然而在这里，希望民主的西方可以提供了东方一面发展的镜子，而非颠到过来。■

注1：Szalai, E. (2004) “Tulajdonviszonyok, társadalomszerkezet és munkásság,” *Kritika*, 33:9, pp.2-6.

注2：这个研究的介绍，请见 Bartha, E. (2012) “‘Something went wrong with this capitalism’: Illusion and doubt in a Hungarian (post)industrial community,” 收录于 Mathijs Pelkmans (ed.) *Ethnographies of Doubt*. London: I.B. Tauris, pp.191-225.



# > 精英 的(不)负责

by György Lengyel,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匈牙利



喜欢运动的匈牙利总理。

**匈**牙利总理热爱体育，特别是足球。他的演说结束语总是“匈牙利，往前冲！”这句台词是从 Berlusconi 借来的。匈牙利的足球现在没能挤进排名，这和匈牙利的政治精英差不多，没啥竞争力。在总理小时候家的旁边有一座体育场，许多人并不喜欢，不过也有其他人表示可以接受。喜欢的人会说：“让

我们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骄傲。”副总理还是地方的政治人物时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你也没什么用处可言。”

这种心态在匈牙利的后社会主义时代就出现了。从 70 年代起，在战争时，私有化、集体化快速展开，但在数十年后，这一切转变了成为一种半市场的共生经济

>>

型态。于是看到了乡村内概起了很多楼房。许多并不适合居住，可是却成为了一种炫耀财。现在统治者精英拿来炫耀的就是那个体育场，他们不需要拥有它，只要后世可以把体育场和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就好，像是金字塔、凯旋门等等一样的意义。

可是，匈牙利精英的问题不只是在他们浮夸、贪婪、低俗。真正的问题在于匈牙利的民主岌岌可危。这才是这些政治经应该负的责任。这不用说其实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而政治精英现只会做做样子，毫无实际作为。

有两个事件值得提出来。第一是精英垄断的取消。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替换那些掌权的精英分子，那么政治转型将会加速进程，且不会造成社会震荡。这也会促成执政精英和反对党精英之间的共识。1989的圆桌会议就是精英取得共识的很好例子。而且桌会议就是精英取得共识的很好例子。共识桌会议就是精英取得共识的很好例子。其实共识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议会民主、基本自由、多党制、私有财产。政治人物必须尊重其他的正当性并遵守游戏规则。若政治精英搞分裂斗争，只在乎政党私利，

那么并无助于民主转型。

另外一见事情就是选举时期的政治献金。政治献金的量已经超出正常可接受的范围太多了，政党的选举资金通常是个模糊灰色地带，但是确有能力左右选举结果。上次大选，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党和反对的社会党用的资金超过了法定的三倍，甚至更高出许多。许多政治献金法案提出了，可是却迟迟没通过。我想这不是匈牙利特有的情况，但是匈牙利受害很深，因为她正处在转型期间。很明显的，这就是政治精英的利益所在，尽量维护灰色地带有利于他们选举，但他们忽略了这坏处。更精确说，很明显这不是好事情，可是精英都可以把这些说成是对的事情。

一位社会党的前总理曾经创了新的政党，暗批了两党独大垄断资金的不正当性，但是却马上被告了，在法庭上他把证据全部摊出来。我们不清楚会什么他之前不讲清楚。现任总理也提到大企业和政治家之间的勾结。一位结。也提民主结。也提到大反对派。也提到大企业和的对派。也提到大企业和政前对派。也提到大

企业和政治总理派。也提到大企业和政治家之也理派。也提到大企业和政治家之间说理派。也提到大企业和政治家之间现在派。也提到大企业和政治家之间的在派。也提到大企业和政治家之间政治精英已经打造了一个黑道国家，因为政府可以操弄经济和利用法律建立恩僻侍从体制。

匈牙利没有无政府也没有独裁者，可是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出现，特别是独裁者。执政的保守党拥有的保守党表未国有的保守党表未来会的三分之二多数，已经制定新的宪法，制定新的媒体法律，新的选举法，新的劳动法。这些从未取得广大的同意。这些法律大大削减了既有的权利，限制司法审查、戕害民主制衡的机制。欧盟的影响力有限，以及批判知识分子肌弱无力。总理的威权领导相当有害，而人民则也害怕不稳定，所以要求社会照顾和平等。

这些都鼓励了民粹修辞和经济自由的修辞，然后变成借口征税，特别是对那些国外的银行。也变成跟其他国家谈判的筹码。另外，这也有可能不是修辞，而代表的政治人物真正这么想，要对抗外来资本

好让国家免于“被殖民”。他们也考虑削减外部债务，总计 GDP 的 80%。然而社会学家看穿这一切，因为这些社会工程其实是透过扎稻草人来鼓动民族主义。这个副作用就是会产生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党。我们在上次选举中看见了这股反动力量的诞生。

三分之二的匈牙利人口不会说外文。国家的媒体把国外对匈牙利的批评当作污辱和攻击。多数的独立媒体选择在英雄与愚蠢之间做出诠释。现今的政治精英因为相当分裂，所以这样的批评算有道理。但是 1989 的圆桌共识要被竞争的选举所取代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总理并没有隐藏他想要克服这种分裂现状的企图，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力量的中间领域”或是说，巩固其领导地

位。他宣称，精英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大家开创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是幻觉。在政治理论家 István Bibó 的眼中，这不是精英的社会责任。真正的是他们的自私与无赖，在释出公共土地和用烟草拢络桩脚的例子终究可以看出来。Bibó 的对手 György Lukács 曾说 Dostoevsky 是英雄，引领我们到真理处。可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任何鬼影子。

2014 年春天匈牙利将会举行大选。这会是场自由的选举，可是公平性就待商榷了。因为很有可能执政党会利用执政资源去操控媒体和选民。

总理很媚俗，不怎么重视政治理念。他其中一个演说中引用了一位冰上曲棍球员说的话：

“滑向有冰的地方，而不只是在冰上滑。”这或许呼应他的执政，他

应该了解到政治人物应该去了解人民的需要，构想人民的未来，而不能目光短浅。不过显然他并不了解这点，不知道目标为何，而且划地自限，修改游戏规则，最后哪里都到不了。

只要还有选举，那或许就还有机会改变现状，这就是民主巩固的真谛。不过这可能要花久的时间，而且我们的精英们显然并没有朝着这方向前进。 ■



# > 南非

## 来自地底的女矿工

by Asanda Benya,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南非



15a.

**在**南非的一处大矿场中有 48000 名女性矿工。其主要开采铂和金为主。这些女性是主要的劳动力，除了采矿之外，还有打造支撑架、牵水管、操作机器等等，全都在地底下进行。

2008 年我花了 3 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南非的铂矿场。身为民族志学者，我和地底女矿工一起工作和居住。我的主要研究目标是理解女矿工所面对的环境变

化。后来我从 2011 到 12 年又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地底下做田野，这次我当缆线工人，并负责清理石头然后吊回地面，以便钻凿。

当我轮到早上 4 点的班时，我必须 3 点就从宿舍出发。若是住得远一点的女矿工就要 2 点就出发。这些女性搭乘大众交通工具，通常是搭巴士到镇上，然后打出租车到宿舍，那边会有公司的接

>>



Asanda操作钻机。

驳车。这是一趟遥远、危险、而且昂贵的路程，大概占去了她们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你知道一个月工资多少吗？只有 120-150 美元。

艰辛的路途并没有随着到了矿场就结束了，反而到了矿场之后更加辛苦。首先是要进到笼子里面从地表垂吊到地底，大概有 2-3 公里那么深。这个不过电梯那么大的笼子几满了 50 多人。在这里面呼吸可是要跟最靠近你的人同步，否则会很难过。而且里面不能开灯，这是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些人会借机乱摸妳的胸部等，因为他们知道妳也拿他们完全没辙。

当妳到地底下时，妳会发现妳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黑暗、混浊、湿热。矿场通道很矮，有时只有 1.2 米高，那妳就要用爬的，还要小心翼翼。有时我们要花 8 个小时在这个地方，跪在地上，然后在钻洞的时候要防止岩石崩落。这地

方完全让我觉得死亡其实就近在咫尺。

我什么工作都要做，包括缆线、抽水、移开矿石、搬运、以及随时待命支持。操作绞盘缆线是个复杂但是可能会致命的工作，包括控制缆线等。只要有一个小小不注意，就有可能乱掉然后打结。所以操作这种东西靠的是经验，不是正规训练就可以弄懂的。

我们除了要做所有的工作之外，身为女人，我们被认为是那些“真正”男性矿工的助手。他们什么都要叫妳做，可是做得再多就只是帮忙而起，不是真正在工作。只有男人做的才算真正的工作。我们有时候也要当男工人的服务人员。每次要换班前，钻洞后，我们负责要放上炸药。

我很快学到，若要生存，那么就要脸皮厚，并知道怎么在地底作这件事情。我在受训时知道了很多规则，可是真正上工后学到的则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

套是由男矿工制定的。若不服从，妳就不是称职的工人。为了被接受，我要学习怎么走路、讲话、工作、搬运、用灯等等。这里有另一套地底的语言。除了 fanakalo 我还要学其他的语言。

矿场的暴力和危险，让我们必须“忘掉自我”。有人跟我说，若把真正的我带到地下来，那是很危险的。我真想知道我们要怎么如何不是自己。后来我了解到忘掉自己就是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工人都说这叫做“地底的我”。这个我，必须冒险、忘掉家人、把暴力和性骚扰当作是文化。这个文化还把工人洗脑，认为每年死个 120 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直到有认识的人死了，大概才会回过神来。不过那也不过两天回过神而已，看到人被抬出来，隔天知道死了。过后又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又回到地底下的我。

回到地面上，我一直在理解在地底工作意味着什么。死亡作为解放和超越？那我的两个身份呢？地底冒险，地上谨慎。我的同事很多人都有小孩在上学。我想，看着小孩能够上学，那大概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解放和超越吧。■



# > 科特迪瓦

## 手机的象征资本

by Jordanna Matlo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Toulouse, 法国

手机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在** Adjamé 的 black (1) 一书中有一个令人觉得可惜的一幕：那就是失窃的手机。上百人排队挤在主要干道上面，所有人人手一支手机，甚至更多支。他甚至更多支。们甚至更多支。可能小小声说话、也会大声喊叫。有些人用手和脸保持安静，有些人则是多走几步回应顾客的杀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的是年轻，有些年长，有些看起来很累，或是穿着星期五样式的衣服。他们卖各种的手机，多数的功能只有很少部份的人用得到。若

是供给和需求有关的话，那么科特迪瓦 Abidjan 的手机市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若我们看从 2008 到 2009 年 Abidjanais 的失业民众的生活型态，我们会发现手机其实是该城市很重要的文化之一。从大城市的大手机公司广告广告牌上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搭配一个受欢迎的女歌手，然后还有一支手机。这幅景象很有威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全国有一千七百万的人拥有手机，而全国人口只有两千

两百四时万人。可是别忘了 42% 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以下。而穷人用手机的意义，象征性大过于实用性。每支便宜手机都可以镶上很贵的外壳，实时功能并不怎么样。最便宜的二手手机可以只卖 5000FCFA 而已。(2)

当我遇到 Calice 时，他是一个 23 岁的小贩，头上戴着 iPhone 的耳机，俨然是个活广告。但是，这只是看起来而起，因为他的手机没电一阵子了，而且没钱换电池。而那些配件则花了 27000FCFA

的头期款，其尾款还要40000FCFA 包括安装费。对于男人来说，手机势必被配件。在 maquis (露天吧台)，手机都放在桌上，或放着音乐，或是就是放着，然后一边喝饮料。社会地位的标记所显示的是一种被看见的民主方式，标示着现代通讯科技，更是这边社会的重要象征符号。

手机也和边缘社会的匿名性遭遇在一起。名字和电话号码，有时候单单只有号码，就构成了 Abidjan 街头涂鸦的元素。号码被画在墙壁上，或是在出租车上，可能还代表着希望可以那一天可以打给这支号码。一位外国领事馆工作的朋友说，他最后一天上班时，穿的衣服上面不是在键的图案，而是手机号码。所以号码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纪录，像是没注册的人、非法的、不被看见的人。号码代表着现代性，也代表社会的距离，而你的通讯簿则代表了你的社会地位。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叫做 Doug MC 的音乐家谈天，他拿出一本杂志，指了一个在纽约表演的艺术家给我看。那是科特迪瓦人。他秀给我他美国的手机号码，并吹嘘说他这位艺术家朋友常 call 他。此外，接电话也代表对方愿意花钱打电话给你，重视你。你会表对方愿意花钱打电话给你，重视你。看到不论在任何场合，像是公共场所、教室、婚礼等地方，手机应该要关振

动的，但是大家都把手机开很大声。

若西方的刻板印象是男人要用车子去把妹，那么在 Abidjan 则是用手机把妹 (而且把到以后还要送对方手机加通话点数)。我的还要送对方手机加通话点数朋友还要送对方手机加通话点数说友还要送对方手机加通话点数，友还要送对方手机加通话点数这种还要送对方手机加通话点数方式既是祝福也是诅咒，意思是给女方一支手机当作礼物，也是追踪，因为男方会希望女方不论到天涯海角都会接电话。此外，手机也决定了穷小子的人生希望，因为就连最穷的地方还是人手一支。我问 Erick 他会不会想要把他那支只有 5000FCFA 的手机升级，他说：“当然啊！我是人啊，我可是有野心的！” Samuel 则解释作为一个男人，有生理、情感、社会的欲望，是都必须被满足的。此外他还说：“每个人都会因为这些东西得到快乐与满足，像我就很高兴有这支 Sony Ericsson 呢！”而且有时候还是越多越好，因为一个人有两三支手机可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因为每支手机有不同的电信网络，这代表你可以有能力选择便宜的费率去打给你的朋友。

不论手机是个好的装饰、娱乐、或是拿来接电话，边缘的 Abidjanais 人很少把手机用来打电话，因为只有拨打电话要付费，而且通常他们没什么钱。

我接到的电话通常都是从 cabine 打来的 ----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电话亭，有木制板凳和桌子，由一位年轻人负责营运，提供手机和任何电信业者的点数。通话点数最多可到 100,000 FCFA，买月多会附加月多的额外点数。打电话的人通常会马上挂掉，意思是要对方打过来；或者是传个简讯要对方打过去。若要对方打过来，那通常都会透过 cabine 传送点数给对方。但不像 tag 的是，这反映出了拨话和收话之间的阶层关系。有钱人打给比较没钱的人。非洲有头有脸的人就是这样维持其社会地位的。这种财务关系代表的不仅是支配关系，还是种社会债。■

注 1: 这被认为是 black (英文)，这个 Adjam é (Abidjan 最大的市场) 的部份通常就是黑市，有很多偷来卖的货品。

注 2: 我研究时 1USD 等于 500FCFA。

注 3: 人们通常都常认为买为很为昂贵的贵手机是机一种储蓄的蓄方式。式因为若需要现金的话，可以卖掉换一只比较便宜的手机。然后这些人通常没有银行账号。



# > 欧洲社会学年会报告 Torino 2013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国, ISA出版副会长, 2010-2014



在Turin的欧洲社会学执行委员会。

ISA 的出版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找人代表 ISA 去参加会议并撰写报告。这篇文章就是报告之一。但是要怎么报告个法呢？因为这场会议有 2600 人参加，有 4000 余篇的摘要送出，其中 3200 篇被接受。所以任何的参加者都不可能亲自参加所有的场次。所以我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参加各种主题的场次，抛开我个人的兴趣，或是找寻新鲜的事物。我

也不确定这个策略是不是很好，因为我好像遇到更多的政策制定者而非学者。无论如何，我想这是很有趣的，另外一方面，社会学也更有机会被政策制定者所重视，这何尝不事件好事。

时间安排是每场一个半小时，一场通常都有 3-4 篇文章，1 篇文章只能简短报告。影响就是要嘛只能报告理论没有数据，不然就是只有资料没有理



论。报告者可能时间还算够，可是观众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所以很难有什么延伸的讨论、发表等等。不过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短时间内知道重点是什么，例如：

-- 世俗主义不用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构成。

-- 前共产主义国家可以被归类为后殖民。

-- 商业娱乐的研究可以促进我们对文化阶层化的理解。

-- 危机会带来转机，给年轻人更多机会。

-- 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响应给健保体系的研究者有些用处，也要考虑到职业社会学的观点。

-- 展演或是艺术为基础的传记方法可能对大众来说并不是那么可得。扎根理论对于欧洲认同的研究发现了 8 种不同的欧洲认同。

-- 老人发现弱现连结，结也就是连结是到结是其他

是边缘是社群是的群是人，对他们来说有支持的作用，因为和那些亲人连结所要负担的责任比起来，少得多了。

-- 许多人（特别是德国和瑞典人）正从事时尚研究。

-- 家庭社会学长期忽略了那些独居的人。

-- 极右翼的成功归因于投票制度（强制投票、大赐宣传、把对政治反感的人带了近来），以及是否存在温和右派有关。

-- 当代右翼政党把焦点放在族群文化上，而非种族。欧洲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代罪羔羊，在西欧是伊斯兰，东欧是共产党历史。

-- 许多使用次级数据的料报告，提供了描述，但是没有解释，认为若有更谨慎的质化比较方法，小一点和没那么形式化的样本，会是有用的。

欧洲社会学会发行一

本新期刊了。原本就有 European Societies，现在新的是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都像会员提供电子版，并由 Routledge 出版。第一期会在 2014 年 3 月初刊。主编有 Paul du Gay, Ricca Edmondson, Eeva Luhtakallio, Charles Turner。编辑有 19 人，可是很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半个来自东欧。■

# > 最後的宣布

拉美社會學會(ALAS) 第24届大会委员



「拉丁美洲的危机和社会浮现」是第29届的于Santiago举办的拉美社会学会大会主题。

此次大会在智利的首都 Santiago 于 2013 年 9/29-10/4 日举行，共有 4168 为社会学家参加，来自拉美和加勒比海的 30 个国家，总共有 33 个工作小组、79 个场次、86 个书籍发表、5 个全体场次。另外还有 12 项会前活动，可谓盛况空前。特别一提的是，为数众多的年轻学者和学生的参与将会为这次大会和学会写上历史的一笔。

这一年也代表了智利政变的 40 周年，每

一位与会者都积极参与了相关主题的辩论，场内场外皆然。他们讨论暴力事件、创伤等，保守派知识分子、政府、国际组织视为是资本主义在智力和拉美的充新建立。

今日的知识社群用想象力和杰出的批判立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整个拉美的社会运动活力和能量也日益茁壮。最近的几个运动是好例子：

-- 在美国的拉美移民争取工作权、健康、教育、社会安全，追

>>

求安家立业的权利。

-- 墨西哥民主教师联盟的斗争，希望拥有真正的教育改革和不再解雇教师 (1,200,000 人加入工会)。

-- 整个拉美对于自然资源的不当滥用和开发，像是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业、渔业、森林、海岸、水资源。

-- 哥伦比亚大量对于和平谈判的要求将会为这块大陆带来真正的和解。

-- 古巴长期对于争取自己国家主权和封锁的努力。

-- 对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厄瓜多尔的民选政府的肯定。

-- 争取民主转型

-- 反对新自由主义政

策对于健康、教育、社会安全、年金的削减。

-- 反对暴力、恐怖，争取安全。

-- 反对整府的腐败、挥霍，特别穷人日益增多。

-- 恢复原住民真正的自主性和主权，包括了非裔和岛屿住民。

以上这些需要系统性的工作，由整个大陆的社会学家来参与。我们的社会问题包括了破坏、贫穷、排斥、危险、暴力、对于灾害和经济危机的脆弱。所以必须有 100% 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批判自由。政策必须增进社会福利，由负责的国家 and 人民一起打造。也要克服殖民的知识和权利，追求真正的学术自主，摆

脱那些评鉴的束缚、享有真正知识交换的生产的权利。这些目标是我们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愿景。

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论是公立或私立都必须努力做研究，带给国家和社会更好的利益和权利去维护正义、自由、多元。

ALAS 重视这些目标，标并标认为有责任继续推动和追求，让更多的社会学家一起来参与，打造多元典范、务实经验、自主认同 ----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愿 ALAS 鸿运昌隆！我们的 America 生生不息！ ■



# > 社会转型和数位时代

by Elisa P. Reis,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前ISA执行委员, 2006-2010, ISSC的ISA代表



| Elisa Reis是ISSC新副理事长。



| Alberto Martinelli是ISSC新理事长。

“社会转型和数字时代”是世界社会科学论坛的主题，由国际社会学委员会 (ISSC) 所主办，在 2013 年 10 月 13-15 日于 Montreal 展开。超过 1000 名、来自超过 60 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家、科学管理者、专家等就数字议题，发表了超过 750 场的报告，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的附带讨论活动。

全体参与的场次聚焦在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观众参与，也带来了很热烈的跨学科讨论。ISSC 邀请了请一个年轻的轻社运组织来报告，除了他们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提出了非常具挑战性的问题，

鼓励在场与会人士去合作从事研究。

ISA 所支持的场次是主要在加拿大社会学中所常见的议题，包括数字时代的利与弊，以及给知识生产的政策介入的机会。标题是“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2013 加拿大一迈向 ISA2018 世界大会”，四场报告相当代表了加拿大的社会学。Patrizia Albanese 是加拿大社会学会的理事长当选人同时也是 2018 在 Toronto 的在地委员会主席，和 Howard Ramos、Rima Wilkes、Cheryl Teelucksingh 等人让我们看见在横滨之后的世界大会有多么令人期待。

ISA 也参加了“21 世纪变迁中的地缘政治：人权和

伦理”场次，由世界心理学会会长 Saths Cooper 所主办，藉此期待下一届的 ISSC 世界社会科学论坛主题：改变世界，迈向正义。第参届社会科学论坛将会在南非的 Durban 于 2015 年 9 月举办，希望各位可以共襄盛举。■

注 1：主编：恭喜 Elisa Reis 成为 ISSC 的副理事长和 Alberto Martinelli (前 ISA 会长，2000-2004) 当选 ISSC 的理事长。

# > 俄国团队

by Elena Zdravomyslova,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 ISA执行委员(2010-14)

我们的团队组成相当有弹性，核心的翻译成员有Elena Nikiforova, Anna Kadnikova, 和Asja Voronkova，其他成员则是以轮值的方式付出贡献，并其他新成员的加入。我们各自属于不同的社会学机构组织，而计划则是由St Petersburg的社会学会负责，这是俄国社会学会的地区分支。我们也很高兴成为全球对话翻译团队的一员，让我们可以知道全世界的社会学社群最新动态，也拓展了我们的视野。翻译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这就是“做中学”的意义！希望全球对话继续阐释社会学多元观点，并希望可以知名全世界！



Elena Zdravomyslova 拥有社会学博士，是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 (EUSP) 的教授，该校性别中心的执行长，也负责社会学独立研究中心。其研究和教学的领域包括了：性别、女性运动、质化方法；专长领域包括俄国的性别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照顾社会学、传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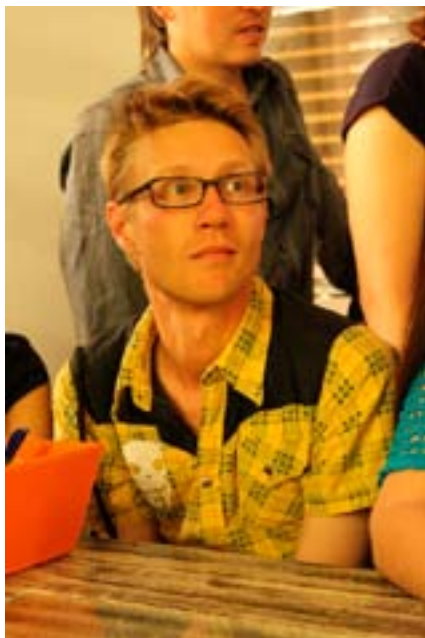
Anna Kadnikova 拥有社会学硕士，从 EUSP 毕业，兴趣包括了俄国 pro-life 社会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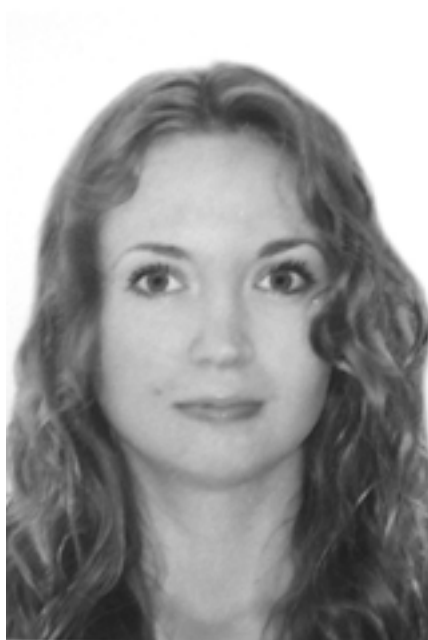
Elena Nikiforova 是 EUSP 独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成员，拥有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的社会学学士，在该校国际关系进修，有爱尔兰 University of Limerick 国际关系的硕士。她主要的学术兴趣在于社会流动、空间，深受全球化和跨国化辩论的影响，并对边界研究很感兴趣。现在其研究专注在空间变迁、认同、生命历程，以及这些现象和前苏联帝国的政治空间重组的关系。专长地区是波罗的海国家，西北俄罗斯、极北俄罗斯。



Asja Voronkova 是一位音乐家，也是摇滚团体 Patience Airways 的创始者。她从 Smolny College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和美国的 Bard College 毕业。其发表过摇滚乐的社会学文章，主要兴趣在于极金属摇滚作为年轻文化现象的研究，同时也是 Laboratorium 期刊的翻译。



Alexander Kondakov 拥有硕士，EUSP 独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成员。他毕业于社会学和法律的国际研究中心，兴趣在法律社会学和酷儿研究。现在的计划聚焦在俄罗斯的性公民权争议。



Yuliya Martinavichene Humanities University (Vilnius, 立陶宛) 的媒体系教师，也是哲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她主要兴趣在于视觉符号学、公共服务广告、集体认同的社会学与哲学。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白俄罗斯的户外公共服广告与论述。



Ekaterina Moskaleva 是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社会学研究生。她的研究兴趣在公共关系、艺术，过去主要参与两个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 Franchise Festival, Geek Picnic (计划主持人) 和 Critical Mass 2013 (研究者和活动规划)。现在她则在 St Petersburg 经济学高中的计划管理者。